



鉴

东西方哲学

年鉴 2016

YEARBOOK FOR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Y

谢地坤 朱葆伟 [德]汉斯·菲格(Hans Feger)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学年鉴

东
西
方
哲
学

东
西
方
哲
学
2016

ARBOOK FOR EASTERN AND WESTERN PHILOSOPHY

...地坤 朱葆伟 [德]汉斯·菲格(Hans Feger)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西方哲学年鉴. 2016 / 谢地坤, 朱葆伟, (德) 汉斯·菲格 (Hans Feger) 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8

ISBN 978 - 7 - 5203 - 0699 - 7

I. ①东… II. ①谢…②朱…③汉… III. ①哲学—世界—2016—年鉴
IV. ①B1 - 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230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马志鹏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n>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50 × 960 1/16
印张 32.25
插页 2
字数 480 千字
定价 19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一

哲学：人类精神的圣火

李铁映

欣闻《东西方哲学年鉴》即将分别由德国德古意特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可喜可贺。这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联合创办的英汉双语刊物必是东西哲学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也是中国哲学与世界哲学相互交汇的一个重要举措。应该刊中方主编谢地坤教授的约请，我想借此机会谈点对哲学的思考，以为序。

在我看来，一个国家、民族，要兴旺发达，拥有光明的未来，就必须拥有理论思维，拥有自己的哲学。哲学是思想的花朵，文明的灵魂，精神的力量；哲学锻造我们的思维，净化我们的心灵，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惟有拥有开创性的哲学思维，才会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但是，对“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自古以来一直争论不休。从哲学诞生的那一天起，哲学家们就在不停地追问，每个时代的哲学家都给出了许多不同的答案，从而构成了哲学的永恒话题。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在回答哲学的最初问题时，指出“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这种以火喻万物的表征，是坚信在事物运动的永恒性中存在着某种秩序，即“逻各斯”。哲学追寻的“逻各斯”乃是一切事物都要遵循的“道”的睿智。这种追寻在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那里，演进为“人能认知什么”和“人应当做什么”的哲学思索。只是与此相背离的是，近现代欧洲哲学中出现了主客二分的形



而上学，疏离了哲学理论与现实世界的联系。

中国是一个东方大国，有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和学说，过去常常被称为“儒学”“道”“道学”“玄学”“理学”等。直到19世纪末，日本学者西周取汉字“哲”和“学”来表达思维智慧，中国学者认同并采用了这一表达。中国哲学的形成和最初的繁盛发生于春秋战国（公元前722~公元前221年）的诸子百家时期。西汉时开始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学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占据特殊地位。佛学的传入（东汉初年）和道家文化的产生发展，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涵，儒释道三家感动呼应、彼此论辩又互相吸收，为后来的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产生创造了条件。明末清初，欧洲文化开始传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大胆吸收外来文化，逐步实现了中西会通，从此与西方哲学交相融会，使“思想史”上升为“哲学史”。

我以为，哲学实质上是自然史、社会史和人类思维史的总结和概括，是帮助人们认识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规律的一种方法，它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必然发生的一种理论形态和文化自觉，是人的精神之精华。

哲学是人类智慧的产物。自然科学的发展在不断展现出大自然无穷复杂性的同时，也向我们昭示了人类认识自然界的无限可能性。每一次重大的科学发现，都宣告了先前所谓绝对真理的终结，都为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开辟了新的道路。然而，哲学是智慧而非具体的知识，它改变的是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它关注的是世界的普遍性意义。质言之，哲学不是具体知识，但绝非抛弃知识，它是在广泛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集中反映我们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是对科学知识的反思和超越。

哲学思想作为人类社会意识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人类实践活动的理论反思；反过来，它对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传统等产生很大影响。设想一下，假如西方历史上不存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不存在古希腊、罗马哲学，那也就不存在对后世影响甚大的西方文化传统。同样，在中国如果没有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争鸣，尤其是儒、道、名等哲学思想的对阵，中华民族的

文化宗旨亦会尽失光华。所以说，人类思想文化里面最精致、最核心的东西就体现在哲学思想之中。正是在此意义上，黑格尔说哲学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本质，是对哲学恰如其分的评价。

哲学的这种本质表明，它是人们对客观世界、对人类社会及其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把握，为人类活动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哲学可以指导人们正确认识自然界、人类的历史发展，可以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和社会关系的调整提供理论和方法，可以提升人们的道德风尚，最终有助于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哲学的这种本质还表明，它是人类文化自觉的最高表现形式，是一门把永恒性与历史性、普遍性与特殊性、思辨性与实践性结合于一体的学问，即是人把自我与自然、社会相融合的一种自觉智慧。哲学总是力图对人类知识寻求可靠而确定的基础，也总是对已有或给定的基础持一种再思的态度。因此，哲学在不断地为人们建构起合理的世界观前提、方法论前提和价值观前提的同时，也不断对这些前提进行哲学的自我审视和批判。这种批判是怀疑，更是反思，体现了人类思维的精邃，所以哲学是人的精神发展的结果。

由此观之，哲学是精邃的智慧，文明的精华，深沉的反思。哲学是一把圣火，始终燃烧着人们的精神！社会越是向前发展，人们的实践越是复杂，社会生活越是丰富多彩，时代的变革越是深刻剧烈，就越是需要哲学，并推动哲学发展！在人类的精神活动中，一切真正的哲学往往作为信念、理想而发挥着支撑作用。

从人类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来看，任何一次巨大的变革和发展，总是以理论变革为先导，理论变革总是以思想观念的解放为前提，而吹响人类思想解放的第一声号角的，往往就是代表时代精神的哲学。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这个比喻非常精辟地说明了哲学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从历史上看，哲学的发展，总是意味着人的思想的解放，哲学首先是“头脑的解放”即解放思想的科学；而思想的解放，又从来是启动和引导整个解放事业的中枢，从而成为“解放的头脑”。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一切进步、一切革新，首先要解放头脑、解脱精神束缚，才能有创造的



动力和创造的能力。哲学也需要不断得到解放，只有对一切知识和问题的不断追问，才能激起哲学的不断进步，进而起到不断解放人类思想的作用。

但是，哲学不是天马行空的产物，哲学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是来自于各个民族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因此，哲学思维的发展又与某一个时代中的某一个民族有关，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个时代、一个民族认识和驾驭自身及其与自然关系的能力。普天之下，一切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中国古语曰：“观乎人文，以化天下。”哲学作为文化之灵魂和内核，“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运用人的智慧思量世界上万事万物，仰观俯察，谈古论今，贯通宇宙人文。由于地域和历史条件的不同，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的差异，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民族性格的哲学。世界有多少种文化存在，就有多少种说理的学问！道与理都来自于存在，来自于人的实践。中国哲学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儒家的理念不仅强调修身治国平天下，而且也重视“为仁由己”的道德境界，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道德金律。道家则强调超拔世间、俯视万象，追求人与万物归为一体的理想，即天人合一。中国哲学的这些特点早在清代就已经受到西方学者的重视，现在不少西方学者都认为，不同民族的哲学存在着明显差异，可以取长补短，而这恰恰是当今世界哲学继续发展的动力和标志。

进入 21 世纪，世界已经演变为“地球村”。各民族的文化交流日益广泛而紧密，对话与合作成为当今世界哲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正是呼应这一现实诉求，中国与德国哲学学者历经三年多的探索商讨，迎来了 2015 年度《东西方哲学年鉴》的即将出版。《东西方哲学年鉴》是迄今为止中欧学者共同编辑出版的第一部大型哲学刊物，除去集中介绍东西方近年来最值得推荐的优秀论著以外，每年还将选取、讨论一个当今哲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参与理论研讨的学者不仅有中德学者，还有东西方其他国家的学者。我衷心希望，这个平台能够集中展示当代东西方哲学的精粹，彰显出东西方哲学学者所点燃的

圣火，肩负传承圣火的使命！我也希望，中国学者虚心向各国学者学习，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各个民族的优秀成果，不仅要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写出流光溢彩的一笔，而且要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世界的合作共赢带来云消雨霁之彩虹！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

2015年9月

序二

中国哲学的现状、问题和任务

谢地坤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的哲学事业发展很快，变化很大。一方面是这个学科取得了一定成果，不论是从这个学科的从业人数、专业杂志和业已出版的论著和译著来说，还是从哲学观念的确立和更新、研究主题的变化和转化来说，哲学作为一种关涉现实世界和人生存在的特殊理论形态，对现当代中国人已经发挥并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国哲学的发展也确实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迄今为止我们尚未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哲学家和哲学著作，我们的哲学作品缺乏原创性，我们的专业成果与我们的现实生活产生疏离和隔阂，我们的哲学教育及课程设置不适应时代的需要，等等。尤其是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哲学这门学科如何能够回应理论和现实的挑战，充分反映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基本经验，从而既能克服自身遇到的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又能教人“安身立命”，实现哲学原本担负的伟大使命，确实是当代中国哲学面临的巨大挑战。

下面，本文对哲学这个学科的三大二级学科，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史和外国哲学的发展状况、面临的问题予以逐一分析，并据此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哲学界所面临的历史重任。

一 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现代中国，哲学界的最重大事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入。马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西方文明的土壤中，但它又不同于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反对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抽象性，主张哲学的现实性和具体性，并且把自己的使命规定为用革命的实践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种实践性是它成为中国理论界主导学科的基本原因。

但是，1978年以前，由于指导思想的失误，我们的哲学照搬苏联模式，简单并且独断地把哲学限制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规定的四条原理上，极大地妨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发展。正是1978年马哲界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才引发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与此同时马哲界对哲学自身也展开了多方面的讨论，这才导致这一学科发生了巨大变化。

总起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学术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多维视野，学者们从经典文本、思想史、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历史观、解释学等多种角度进行研究，多种研究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讨论的热点问题主要是关于世界观、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和价值论等，它们基本上是在对哲学这个学科本身的反思上，那么，90年代关注的问题则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深化了80年代的讨论，并进而把这些问题上升为对哲学的理论性质、研究对象、研究形态、思维方式、派别冲突的发问和思考；第二个方面则是对源于现实生活中一些问题的哲学思考，如发展与代价、公平与效率、真理与价值、传统与现代、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等，这些问题涉及当代中国人在深刻的社会转型中的生存方式、思维方式和观念的变革。^①

进入21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主要有三大任务：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其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最近提出

^① 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近几十年的发展和演变，参见杨谦《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与机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的“科学发展观”及“和谐社会建设”这样几个重要思想，它们是“中国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深入阐明这些思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围绕现代化建设，不断提出新思想、新观点，将为中国探索新的发展道路提供理论支撑。尤其是在当前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及由此引发的一场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过程中，我们所要建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将是代表一种未来发展方向的政治文明和意识形态，它将影响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改变中国的社会面貌。

(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研究。此项研究以原版MEGA2(马恩全集原文第2版)为依托，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相结合的角度，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不同时期、不同手稿的比较和分析，并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作过程中哲学思想的发展和转变过程的追踪研究，深入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哲学基础。

(三)由中央有关部门和学术界共同组织全国力量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该教材不仅要准确表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充分体现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成果，而且还要着眼于把握时代问题，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从而比较完整地体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

这三大任务在本质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我们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去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我们的着眼点是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要用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提炼出的新思想、新观点为未来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则要体现上述两方面的内容，我们的目标就是力图建设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哲学的理论高度回答当今中国现实问题，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富有创造性的灵活运用，使之在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都以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得到丰富和发展。

然而，我们要想达到这个目标，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是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是把它仅仅看作是一种实践需要，还是把它视为一种理论诉求与实践需要兼而有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特点是显而易见的，于是，这里就产生一个二律背反的问题，一门学说如果完全服务于现实，那么，其理论的超越性又如何体现呢？它又如何避免具体问题的纠缠，做到分析社会主义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提炼出哲学概念和思想，具有既符合哲学规范、又有“中国特色”的表达方式呢？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难以解决由此带来的次一级问题：一是事实与问题的脱离，只见眼前具体事实而不见具有普遍性特点的理论问题，缺乏从具体事实中提炼出哲学问题的能力；二是与此相反，学术与政治的分离，脱离社会现实，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当作一种纯粹书斋式的学问，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了其应有的活力。由这样的问题就引申出马哲界关于“哲学中的问题和问题中的哲学”的讨论，并最终归纳到我们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的大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理解表征着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心灵历程与思想解放进程。”^①因此，认识和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在本质上是当代中国理论界和思想界面临的一个极大挑战。

其次是思想不够解放，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还有一些禁区有待突破。比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或者是实践唯物主义，这本是在学术文化层面上的争论，它从一个方面扩大了我們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多维视阈，甚至是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但是，有些人对这种正常的学术讨论横加干涉，不仅坚持早已批判过的日丹诺夫的独断论模式，而且还把它与政治联系起来。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一个倒退。再比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的差异问题，这理应是可讨论的，因为我们由此可以了解马恩哲学思想的发展历程，加深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

^① 孙正聿：《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若干哲学论文评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究。但是，如果我们把“差异”理解为“对立”，并以此禁止这方面的讨论，就会妨碍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

三是不重视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甚至还以各种借口拒绝、歪曲、否定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殊不知，发达的西方社会当今遇到的问题是全球性的，我们明天也可能遇到相同或相类似的问题。比如，当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对生态环境的不满而提出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因为吸收现代西方哲学成果而产生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因为对原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满而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①因为不满意以美国为首的垄断资本对全球经济的控制而提出的“另一种全球化和另一种马克思主义”^②，等等，对我们不仅有理论借鉴的意义，而且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如果我们自视正统、故步自封，不愿意了解和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思想、新成果，那么，我们必定会为此付出代价。以前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交过“学费”，但愿历史不再重演。

这些问题由来已久，之所以拖到现在尚未解决，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哲学观存在问题。一味地强调哲学的实践性和时代性，就只会把哲学当作一种政治工具；相反，过于看重哲学的理论性和超越性，就会使哲学变为一种无的放矢的空谈。不解决这些问题，不在哲学的实践性和理论性、时代性与超越性之间把握一个适当的维度，我们就很难真正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二 中国哲学史研究

“哲学”这个概念本来就是舶来品，我们中国过去虽然有哲学思想，但没有完整系统的哲学学科。只是到了近代，因为我们这个古老

① 相关报道和研究，参见《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7》，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国家创新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 cf. Jacques Bidet et Gérard Duménil, “Altermarxisme, Un autre marxisme pour un autre monde”, in *Quadrige*, Puf, 2007.

的文明体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传统的文明陷入了一种“失语状态”，迫使我们必须在传统文明与现代世界之间做出痛苦的抉择，我们不得不接受西方哲学，我们不得不用西方式的概念系统来表达我们的思想。

我们在接受西方哲学这个异质文化的时候，不是表现得矛盾彷徨、犹豫不决，就是走向非此即彼、或西或中的两极。这个特点在西学东渐之初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从19世纪末的“夏夷之辨”“中体西用”，到“五四时期”的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等，莫不是这个特点的显现。对此，我们的前辈们是有深刻认识的。王国维在20世纪初就提出“学无中西”的观念，李大钊则明确地说，东西文化各有所长，缺一不可，世界文明今后的发展将是两者互相融通，合为一体。冯友兰、熊十力、金岳霖、贺麟等一代大师，都是克服了这种非此即彼的两极模式，尝试用所把握的西方理性思维去探索、研究中国哲学问题，力图开创一条新哲学、新文化的理路，从而使得中国哲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希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在批判和克服了把哲学史理解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军对战”式的独断论之后，中国哲学史研究便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图像。我们不仅在哲学史观、哲学通史方面获得长足进步，而且在断代史研究、学派和人物研究等方面都获得了丰硕成就。概括中国哲学史近几十年的研究，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其基本特色：经典文献研究与思想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

从断代史、学派、人物研究以及问题研究等方面来说，这些年中国哲学史界可以说是空前活跃，成果喜人。仅仅从儒、道、释三家哲学思想研究而言，就有不少蜚声海外的成就。

在儒学方面，先秦哲学、两汉哲学、宋明理学和近现代新儒家哲学等，都出现了专门研究的论著，这些研究集中在中国哲学发展的某一个方面，深化了对中国哲学发展过程的认识。前几年设立了《〈儒藏〉编纂与研究》的国家重大攻关课题，第一期项目现已按计划完成，整理儒家典籍500部，各为“儒藏精华本”。此外，20世纪90



年代以来出土的简帛文献，特别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不少儒家和道家的典籍残篇。这些出土文献提供的资料，有助于我们了解先秦哲学的演变，有助于我们发现中国早期哲学思想发展的某些环节（如孔孟之间、子思学派、儒道之间等），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对于宋儒围绕先秦中国思想的某些阐释提出质疑。

在道学研究方面，其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华道藏》的整理编纂工作的完成和《中华道教大辞典》的编纂出版，这两大工程是近20年来我国道学研究成果的总汇。此外，内丹学是道教文化的内核，也是道教中的绝学。内丹学与禅宗、密宗等修炼方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国内外学术界对禅宗、密宗的研究比较清晰透彻，唯独对内丹学了解极为有限。现在，通过考察大量散落在民间的珍稀资料，笼罩内丹学的神秘面纱正被揭开，内丹学也由过去的江湖文化变为学术文化。

在佛教研究方面，我们首先是在20世纪80年代恢复了在“文革”期间几近解散的一些研究机构，重新刊行一批近现代佛教研究名著。90年代不仅影印出版了《中华大藏经》和多种佛教藏经，更重要的成果是对敦煌藏外佛教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广锬主编《藏外佛教文献》）。此外，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加强了对近代佛教的研究，尤其是对佛教在晚清思想界转换为儒家学术资源的探讨。当代佛教研究的重点在于：其一，在佛教史研究上，宗派史的研究渐成气候。宗派史的研究理念和方法，严格说来是脱离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范式而把佛教史作为宗教史来研究的尝试，这方面更关注佛教教理与实践和组织的关系。其二，哲学界仍然坚持中国哲学史范式的佛教史研究，特别是将佛教作为哲学来把握，先后出版了《佛教哲学》和《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等书，将佛教中的许多观念提升到哲学观念的高度来加以检讨，使其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看来，这方面的争论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目前，中国哲学史界在哲学史观和哲学基础理论方面最有争议的，是这样两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与外来哲学的关系，在当前就是中西哲学的关系；二是哲学史的研究如何与哲学理论的建构相统一。

关于哲学史观，我们首先是把中国哲学史理解为人类认识发展史或文化发展史的一个部分，同时我们也承认，中国哲学史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认识发展史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中国哲学史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在人类认识的漫长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肯定会产生不同的哲学流派、人物，他们对人自身、外在世界及人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必定会有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立场和观点，但只要他们以其创造性的思想把握了部分真理，那就足以构成人类认识发展史的一个环节。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对中国哲学史上各个流派及其代表性人物，如先秦的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及后来的朱熹、王阳明等都予以比较全面的认识和评价；其次，注意中国哲学通史的整体性考察，关注的重点不仅有源流的疏通、流派的传承、史料的考证，而且还有对整个中国哲学发展史的内在规律的把握，对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的细致分析等；再次，中国的哲学思想不是故步自封的，它是在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哲学思想的交往和联系中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因此，我们的哲学思想既有中华文化的特殊性，也有人类共有的普遍性。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就是汉代印度佛教的传入。对此，陈寅恪先生分析说，中国古人“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缺乏精深远大之思”。这就是说，佛家思想之所以传入中国，就在于它弥补了中国缺乏超越性思想的不足。对魏晋以后的哲学家们来说，佛教是我们重新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先秦经典的参照系，它必然会导致中国哲学思想发生变化，甚至会发生很大差异，如魏晋时期的玄学等。当然，我们在这里并不否定佛教本身也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

前些年围绕“中国哲学之合法性”问题的争论，也是对中国哲学史观的一个辨析，它是对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建构与发展进行反思，而其中主要关涉的问题，即是如何处理“哲学”作为某种自西方引进的诠释方式和学科建制与中国本土固有的思想文化和典籍文献脉络之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参与者众多，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这几年伴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好像这个问题



已经解决了，似乎我们中国人可以完全不理睬外部世界的变化、坚守甚至回到我们的传统文明就可以独立自存。不过，一旦我们观察我们生存的现实世界，思考全球化对我们传统文明的挑战，就不难发现，“中国文明的价值世界与历史世界在传统中的自在关联，在现代出现了断裂，迫使文明必须从自在走向自为”^①。假如我们一定要自我封闭，其结果必然是自我放逐，从而使自己处在世界文明的边缘。

其实，这个问题的提出并不是这几年才有的事情。当我们的传统文明在现代必须经过一番自我辩护的论证，方能立足于现代的时候，所谓“中国哲学”不仅引发中西之争，而且还集中地凸显了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问题上。前文提到的王国维先生的“学无中西”的主张，金岳霖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名称不贴切，故而提出要以“在中国的哲学”替换之，都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深刻认识。而对冯友兰先生来说，“中国哲学”之所以是哲学，是因为中国思想史上具有哲学之一般的实质内容，加以“中国的”是指一个普遍抽象概念之下的具体特殊而已。这些前辈的看法和阐述并非穷尽了这方面的真理，但其中给出的启示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在当下“国学热”的亢奋之中，重温这些哲学的基本问题，可以促使我们把眼界放开一些，而不是一味地抱残守缺，自以为是。不然，我们不仅不能发扬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甚至会因为我们的狭隘而使我们裹足不前，更遑论为我们的学术、为国家、为民族做贡献。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遇到学术选择与主观感情和价值冲突时，不能以主观价值去代替学术本身，更不能以感情偏执去代替科学的开放态度，而是恰恰相反，要以科学的态度去对待学术问题，要在前进中发现问题，才能使我们的哲学事业更好地发展下去。

关于哲学史的研究与哲学理论的建构的关系问题，我们不能把这两方面的研究割裂开来，而是要以发展和联系的观点来考察它们。不

^① 张志强：《哲学·文明·现代性——“古今中西”之争中的中国哲学》，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中国哲学年鉴2007》，哲学研究杂志社2007年版，第64页。